
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综述

郭德宏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于 1995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2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华民族的振兴”。

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学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华清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薄一波向会议写了贺信,胡绳让人转达了他的意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主持开幕式并在会上讲了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主持闭幕式并致闭幕词;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在会上讲了对几个重要问题的看法。

会议论文共 114 篇,对抗战史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现将会议论文和讨论中的一些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及胜利的主要原因。

1,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许多学者指出,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中华民族由沉睡、涣散、分裂到觉醒、团结、统一的转折点,是一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战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

2,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歼灭日军最多,对日本

国力的消耗最大,在对日作战中作出的牺牲也最大,并有力地支援、配合了太平洋战场、欧洲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七七事变是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有的认为把七七事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是完全应该的,但把它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还需要充分论证,因为世界大战起码应该是三国以上的战争。但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把七七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理由是:日本当时已与德、意法西斯联成一气,它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是其称霸世界计划的第一步,当时的中日战争虽然是两国之间的战争,但已具有世界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分别爆发的,七七事变就是其东方战场开始的起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反法西斯战争为核心的,它的起点应该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相一致。

4,“远东慕尼黑”阴谋是否存在?有人认为,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等国曾搞过“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牺牲中国,以与日本妥协,由于中国的英勇抗战,这一阴谋才未实现。有的学者认为,这一“阴谋”并不存在,英、美虽然有对日妥协倾向,但总的来说是同情、支持、希望中国抗战的,更谈不上它们要中国投降;在英、美之间对日妥协的程度也有差别,英国妥协性更多一些,美国对日本却有所抵制。有人则认为,虽然没有“远东慕尼黑”阴谋,但慕尼黑的绥靖主义对远东有影响。

5,如何评价中国抗日战争在打败日本过程中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在打败日本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出兵,只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片树叶”,当时日本的国力只能维持3个月的战争,已不能再打下去;有的学者还认为,中国的反攻也在打败日本、促使其投降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反攻规模不大,似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说中国的长期抗战对于打败日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能更确切一些。

6,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倡导、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为抗战决胜奠定了基础;国共两党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是抗战决胜之根本;中国人民与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人民相互配合、团结协作,加快了抗战决胜的进程。有的学者还从民族觉醒、民族大团结、爱国主义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刘华清在讲话中说: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可以昭示今人和启迪后代的最珍贵的历史遗产之一。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最大的努力”。

(二)对日本侵华罪行的揭露和对日本翻案言论的批判。

这次讨论会上许多学者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批驳日本某些人为侵略战争和暴行翻案的言论。

有的论文批驳了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认为日军在南京屠杀 30 多万中国人的罪行是不容否认的,它是日军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残暴性的一次大暴露,与其武士道的野蛮性传统密切相关。

有的论文揭露了日军在上海地区烧杀抢掠的罪行,日本仅在宝山县就杀害 11233 人,连同瘟疫、饥饿宝山县共死亡 2.3 万人,占人口的 19.27%;金山县被烧毁房屋 26418 间;奸淫、抢掠更不计其数,仅世界书局就被劫掠书籍 500 万册以上。

有的论文揭露了日军在浙赣地区和广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1940 至 1942 年日军进行的两次细菌战,就先后形成了宁波、浙赣铁路沿线,浙南、赣东等鼠疫源地,鼠疫波及 38 个市县,死亡数以万计;日军“波字 8604 部队”在广州进行的细菌试验,也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省港难民,并造成伤寒、霍乱、鼠疫等病的流行。

有的论文揭露:日军在齐齐哈尔市内设有代号为“516”的化学武器生产部队,它在华使用化学武器 2000 次以上,伤害人数在 10 万人以上,至今仍有遗弃的毒气弹 200 多万枚,亟待处理。

有的论文揭露了日军在中国制造“集团部落”和“无人区”的罪

行：从 1934 年春至 1941 年共在东北建成约 13658 个集团部落（不包括 50 户以下的集家部落）；从 1941 年至 1944 年在长城外侧制造“无人区”约 5 万平方公里，集团部落 2506 个，同时还在长城内侧和冀东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给中国的社会和生产力造成了惨重的破坏和损失。

有的论文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疯狂进行经济掠夺、劳工掠夺的罪行，指出东北有 30% 的煤（2.28 亿吨）、40% 的生铁（1200 万吨）等大批物资运往日本；华北被掠夺煤 1.2 亿多吨，钢铁 60 余万吨，盐 1000 万吨，碱 20 余万吨，皮棉 2000 余万担，以及大批各类矿石、物资等等，并从华北强掳劳工 700 多万人，伴随家属 200 多万人，占华北总人口的 1/10 还多；其中 4 万人被运往日本，6830 人被残害致死。

有的论文揭露了日本生产和贩卖鸦片、利用烟毒侵华的罪行，向东北移民及在华北进行“思想战”等方面的罪行，指出这些侵略罪行都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损失，如青岛市仅在 1939 年至 1945 年 8 月底就因烟民吸食鸦片损失约 9.3 亿元；日本共向东北移民至少 30 万人，掠夺了东北大量的土地和财富。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对于日军的暴行和掠夺虽已进行了不少研究，但许多基本情况至今还不是很清楚，如日军杀害中国人的准确人数，抢掠的物资、文物和劳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破坏，还没有全面、系统的统计，应由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尽快地在全国调查清楚。

还有不少论文专门批驳了日本某些人为侵略战争和罪行翻案的言论，指出：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和犯下的种种罪行事实俱在，是不容否认的。他们的翻案言论的出现绝非偶然，一是因为军国主义在日本历史上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和很深的影响，二是因为战后对其侵略罪行未予彻底清算，三是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刺激日本某些人企图重温东亚霸主之旧梦。我们必须对日本的“侵略有理论”、“侵略有功

论”和“大东亚战争史观”给予有力的批判和回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国共关系。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是它的倡导者、促进者。但有的学者认为,对于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实行中的作用也应肯定,他们政策的转变是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原因,没有他们的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他们政策转变的原因,既有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是一个投降主义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他虽然挑起过反共摩擦,但是并没有破裂统一战线,这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的一个原因。对于国民党、蒋介石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应该具体分析。

2,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和海外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有的论文指出,广大农民是在国共两党和一些团体的发动组织下,走向抗战并成为自觉的抗日力量的,他们以大量的粮食和兵役保证了战争的需求,积极支援军队作战乃至拿起武器直接参战,作出了无愧于民族和历史的杰出贡献;同时他们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经受了战争与政治的磨炼,其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国共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

有的论文论证,抗日战争时期成立了各种青年抗日救国组织,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了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斗争,基本上实现了爱国青年的大联合;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为中国革命培养造就了大批骨干力量;大后方的青年运动,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波澜壮阔的青年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有的论文论述了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和海外学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指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统一指导,初步实行了与工农的结合和阶级属性的转变,并积极投身于社会革命的实践。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拥有了一大批意志坚定、素质优良的知识型干部,加快了中国的革命进程。还有论文论述到,抗战时期的海外学人,主要是指在海外的留学生,这是近代中国在救亡意识激荡下崛起的一支新兴社会力量,他们首先在海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大批回国直接参加斗争。正是由于他们的活动,使抗日救亡成为一场具有广阔的地域性和广泛国际影响的反法西斯运动。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个战场和军事斗争。

1,两个战场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会上关于敌后战场的论文较多。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击和牵制了大批的日军,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对敌后战场是否称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则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主战场。有的学者则认为,从全民族抗战和提高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方面考虑,不一定要对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作出主次之分,对敌后战场抗击日军的比例也很难作出准确的论证。有的论文对敌后战场的军事战略指导和毛泽东指挥敌后抗战的谋略艺术作了分析。

会上收到的关于正面战场的论文不多,这些论文分别对淞沪会战、湖南战场、滇缅战场等进行了论述。有的论文对1942年5月滇西沦陷后形成的滇西游击战场进行了论述,认为这个战场有着鲜明的国际性、全民性的特点。有的论文对中国空军和海军的抗战进行了探讨,认为它们抗战都是很英勇的,肯定了它们在抗战中作出的贡献,同时联系现实总结了其经验教训。有的学者还提出,过去说正面战场进行了22次大会战,实际上大的战役不只22个,例如绥西战役等规模就比较大。对于国民政府军是否也有一个敌后战场,如何评价国民党“持久消耗战略”和中共持久战略的异同,国民政府在淞沪战役时有无主动引日军南下以改变日军进攻方向的

战略意图,以及对于一些战役的评价,也存在争议。有的学者提出,对正面战场的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绩,但仍然比较薄弱,需要进一步加强。如对参战各部队对抗战的态度和表现,对各个战役的战绩等情况,应加以区别,既不应任意拔高,也不应有意贬低,应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价。对于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档案材料中的真伪,也应注意鉴别。

2,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有的学者认为抗日战争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因为敌强我弱的形势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变,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抗日战争就胜利了;从1944年开始的局部反攻只是战役战斗的进攻,不能称为战略反攻。有的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理由是:(1)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无论东方战场和欧洲战场都举行了大反攻,中国敌后战场渡过了1941至1942年的艰苦阶段,从1943年下半年起形势已好转,中国的形势同国际形势是一致的;(2)战略反攻一般都是从局部反攻开始的,因此局部反攻应包括在战略反攻之中;(3)战略反攻不一定都要在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才能进行,在敌人力量相对削弱的情况下就可以开始;(4)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敌后战场开始发动一系列较大规模的战役,如林南战役、车桥战役、阜宁战役等,从1944年初又正式发起局部反攻,正面战场的滇缅战场这时也展开反攻,因此应该说中国抗日战争存在战略反攻阶段。

关于战略反攻阶段开始的时间,有些学者认为是1944年初。他们认为,发生豫湘桂大溃败反映了战略反攻前期的不平衡现象,不能因这场大溃败而否认战略反攻阶段的开始。但有的学者认为这样讲有些勉强,不如说战略反攻阶段从1944年夏、1945年春或8月上旬开始比较恰当。

(五)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

1,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有关政治方面的论文,有的对国共两党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有的论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

权建设及“三三制”、廉政建设等。许多论文还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工。有的论述了八路军对日军战俘实行人道主义的政策和措施,有的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宗教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有的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的工作和争取伪军的工作,前期以农村为主,后期以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主;争取伪军的灵活政策,对瓦解伪军、争取伪军转向抗日起了重要的作用。

2,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变革。有的论文提出,抗日战争具有抗日与民主改革的两重性质,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有利于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改革,同时注意团结一切阶级阶层共同抗战,从而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群众充分发动了起来,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导力量。

有的论文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1)嬗变的经济结构:这是社会变迁最根本的动力,它大大削弱了封建势力,提高了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2)重构的政治形态:通过管理机制的农民化,使旧的形态全面失效,中共政权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认同;(3)裂动的文化层面: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村传统的意识形态,新的文化观念逐步确立。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前所未有的。

(六)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和文化。

1,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成熟。有的学者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伟大实践,使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走向成熟,在许多方面获得发展。

有的论文论述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指出它在这个时期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精神实质、主要原则和方法论的意义,至今仍未过时。但有的学者指出,毛泽东在文化思想中未提“民主的”,似乎不足,将民主与大多数相等同,亦不全面,还有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那里等等。张闻天在谈文化时将“民主的”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相并列,可谓补其不足。但张闻

天未提批判地继承古代优秀文化和吸收外来进步文化问题,毛泽东则强调了这一问题,可以说他们是互相补充,共同提出和阐明了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对中国文化发展起了指导作用。

有的学者论述了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后大后方的人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次人心大变动不仅影响了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局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及时地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从而把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有的学者还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成规模和产生广泛深入影响的时期,这时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观察中国社会和历史,指导革命斗争实践,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在学术文化领域宣传历史唯物主义,阐发了促进民族解放的思想理论,在思想理论上为新中国代替旧中国作了准备。

2,其他方面的思想文化。有的学者全面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指出这个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非常活跃,教育学术有所发展,取得不少成就,同时也有明显的分歧和争论;抗日救亡思想文化的广泛宣传,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对于全民族战争的开展和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有的学者论述了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指出他是用封建的正统政治、伦理思想来解释三民主义,即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智仁勇”等等;他最强调民族主义,说明他民族观念还是比较强的,但他也多次讲所谓“弹韧”、“忍辱负重”的德性,为其动摇性妥协性开脱辩护;他也讲民权、民生,但他决不是民权主义者,而是专制主义者;他的理论主要是为加强他对国民党的控制,加强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所以尽管他在抗战中作过一定贡献,但威信只能越来越下降。

有的学者还专门论述了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指

出反法西斯战争大大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战斗性,赋予中国文学反对侵略与奴役、保卫国家独立、追求民族解放的崇高的思想主题,并使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空前高涨,使中国文学作品中涌现了大批前所未有的人民爱国英雄的充满血肉的光辉形象,中国作家也为世界人民保存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许多值得人类永远珍贵的历史画卷。

(七)抗日战争时期的外交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国民政府的外交和战时中外关系。有的论文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的基本方针是“苦撑待变”,具体方针是中立德国,不使为敌;联合苏联,争取军援;依靠英美,力促其变。总的来讲其外交方针是明智的,外交方向是正确的,外交活动表现出了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所少有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可以说是基本成功的,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国,争取友邦。

有的论文论述了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政策总的趋势是向着制日援华的方向发展,1941年的美日谈判与慕尼黑事件有根本的不同,它的目的不是为了绥靖日本,而是为了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美国与国民政府的特殊关系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是它对华政策的基本点;美国由战时的扶蒋容共抗日向战后的扶蒋反共的转变是一个过程,并不是在哪一天突然发生的。有的学者重点探讨了开罗会议对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的特殊影响,认为在中美战时同盟中,美国注重的是建立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中美战略关系,国民党政府关心的是如何维持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开罗会议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起点,但它的影响是复杂和长远的,它使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失去了选择的余地,终于使美国在战后卷入中国内战,并导致美国与新中国长达20年的对抗。

有的论文综论了抗战时期的中苏日三角关系,认为这种关系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37年7月中日全面开战到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订立前,中苏关系大有改善,苏日关系渐趋恶

化,从而对中国抗战有利;从1940年9月至1943年下半年,苏日签订中立条约,但苏联并未放弃联华制日政策,后由于新疆问题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对中国抗战产生了不利影响;从1943年下半年到日本投降,苏联准备对日作战,中苏关系改善,但中国被迫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使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受到了损害。

这次会上有论文分别对抗战时期的中英、中德关系作了论述,认为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国家宣言》的发表,意味着中英正式结成了反日“同盟”,但这一“同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同盟,而是不协调的同盟,英国在处理两国关系时仍以不平等甚至蔑视的态度对待中国;而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中德关系,经历了从“蜜月”到降温并最终断交的三个历史阶段,这种关系主要是基于军火和钨矿贸易,双方互有所求。它的变化对远东国际局势的演变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2.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有的论文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起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的主要矛盾已由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转化为世界各国人民与法西斯侵略集团间的矛盾,这就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决定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有的论文论述了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联系及合作,指出这种联系及合作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资本主义大国联系及合作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

有的论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改变孤立状态走向世界从多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政治地位,取得了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积极支持,也了解了美、英、苏等国的政策,得以利用他们支持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积极作用,限制他们损害中国革命的消极作用,为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夺取抗战乃至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八)加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些意见。

许多领导人和学者在讲话和讨论中,还对今后如何加强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提出了建议。如继续开拓研究领域,特别要加强那些研究薄弱的领域;对中国军民的伤亡和财产损失等重大史实应尽快调查清楚;改进研究方法;加强各学科、各地区以及与港澳台和外国学术界的交流,及时吸收各方面的新成果;加强组织协作,尽快编纂出全面系统的大型资料丛书和写出多卷本的抗日战争史专著;改进写作方法和文风,增强可读性,采取多种体裁、多种形式将这场伟大的战争丰富多采地表现出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党史研究与教学》介绍

《党史研究与教学》是由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和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向国内外发行的双月刊。该刊全年6期,辟有10多个栏目。

该刊适宜于从事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的各级党校、干校、讲师团、高等院校、专科学校的教学和研究人员订阅。该刊由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发行组发行,邮政编码:350001。地址:福州市柳河路61号。